

# 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研究

##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周小兵, 吴玉锋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西安 710127)

**摘要:** 农民对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忠诚度对制度可持续发展和保障效果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5 年全国 5 省的调查数据, 运用忠诚度理论和代际差异理论分析不同世代农民对农居保制度忠诚度差异。结果表明因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作用, 农民农居保制度忠诚度代际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不同世代农民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因素, 发现青年农民对农居保制度忠诚度主要受到制度满意度的影响, 中年农民的制度忠诚度主要受家庭保障能力和村域规范的影响, 中老年农民制度忠诚度受制度知晓度、制度满意度以及村域规范的影响。

**关键词:** 农村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 制度忠诚度; 代际差异; 年龄效应; 世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8)01-0079-08

### Loyalty of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ZHOU Xiaobing, WU Yuf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Farmers' loyalt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uarantee effe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 provinces in 2015, using the theory of loyalty and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of the farmer's loyalty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to the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ge effect and the cohort effect.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armers' system loyalty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loyalty of young farmer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degree of system satisfaction, the middle-aged farmers' system loyalty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ability of family support and village norms, the loyalty of old farmers is influenced by the system satisfaction and village norms.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system loyalty;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age effect; cohort effect

2012 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实施, 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止 2015 年,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已达 5.05 亿<sup>①</sup>。然而, 就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农居保)而言, 较高的参保率实际上是捆绑缴费制度和

社会动员的结果, 并非出于农民对制度的内在认同, 其持续参与面临困难<sup>[1]</sup>。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顾文静<sup>[2]</sup>基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 发现有明确长期缴费意愿的农户只有 43%; 黄瑞芹<sup>[3]</sup>对湖南省的调查显示, 2010 年比 2009 年的参保率下降了 3%, 出现了农民退保现象; 吴玉锋等<sup>[4]</sup>基于甘肃省会宁县的调查发现, 仅 75.43% 的农民具有长期缴费意愿; 姚俊<sup>[5]</sup>对江苏等省的调查发现, 20.1% 的农民存在断保行为。农民持续参保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养老金水平, 更关系到制度保障效果

收稿日期: 2017 - 12 - 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3CRK004);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 (15JK1743)

作者简介: 周小兵(1991—), 男, 河南洛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的发挥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界研究发现,农民的年龄与其持续缴费意愿或行为显著相关,年龄越接近60岁,农民缴费意愿越强,持续参保可能性更高;而中青年农民缴费意愿较弱,持续参保可能性相对较低<sup>[6,7]</sup>。对此,学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年龄越大,身体素质越差,农民养老风险感知越强烈,越倾向于参保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跨期收益特性使得年轻农民需要缴纳的费用越多,回收成本的不确定性更强,因而更倾向于对制度持观望态度<sup>[8]</sup>;此外,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求“最低15年缴费年限”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部分人选择到45岁参保,使得45岁成为农民是否持续参保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sup>[9-11]</sup>。

已有研究发现了年龄和持续参与意愿的显著相关性,并将其归结于农民个体风险感知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没有对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参保意愿进行研究。基于此,笔者拟基于2015年的调查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探究不同年龄阶段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农民制度忠诚度提供借鉴。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忠诚度是消费者对产品内在认同和重复购买行为的总和<sup>[12,13]</sup>,包括认知忠诚、情感忠诚、意向忠诚和行为忠诚四个维度。认知忠诚是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内在认同,情感忠诚是消费者对产品及其厂商的态度,意向忠诚则是消费者重复购买的意愿,前三者属于态度忠诚,行为忠诚则体现为消费者的重复购买行为<sup>[14-16]</sup>。Griffin<sup>[17]</sup>按照行为与态度两个维度把消费者的忠诚度分为四种类型:低态度忠诚与低行为忠诚结合的缺乏忠诚,低态度忠诚与高行为忠诚结合的虚假忠诚,高态度忠诚与低行为忠诚结合的潜在忠诚,高态度忠诚与高行为忠诚结合的理想忠诚。

代际差异理论源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sup>[18]</sup>的代际认同研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态度和价值观形成于社会化时期,每一代人在社会化时期共同经历一系列事件,这些集体记忆塑造他们相似的

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并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趋于稳定<sup>[19-21]</sup>。每一世代以特定的价值观念与其他世代相区分<sup>[22,23]</sup>。特定价值观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既包含生理年龄和个体生命历程带来的年龄效应,也包含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的世代效应。学界运用该理论在员工价值观念、工作态度和绩效、消费观念和行为习惯、移民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合<sup>[24-29]</sup>等领域取得了颇多的研究成果,而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领域,研究还停留在年龄差异和持续参与意愿相关性等狭窄的范围。

代际差异理论的前提在于如何划分世代。代际划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人口学以固定时间为间隔的代际划分,如70年代、90后等;另一种是社会学通过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划分的不同代群<sup>[18,21-22]</sup>。显然,社会学的划分方式更能反映不同代群存在的特有差异<sup>[12]</sup>,而人口学的划分在国内更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诸如“90后”等代际划分。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年龄跨度为16~59岁,既有研究多以15岁为界限划分代际,15年的时间跨度不仅能够体现不同的生命历程差异,也体现了不同时期社会环境造成的世代差异<sup>[10,30]</sup>。1970年之前中国农村仍未实行计划经济,集体主义观念浓厚;后来历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1984年<sup>②</sup>)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等重要历史变迁,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此,本研究将1970、1985年作为时间节点,以15岁为间隔将参保农民(年龄为16~59周岁)划分为三个群体:16~30岁为青年;31~44岁为中年;45~59岁为中老年。

农民年龄越大身体素质越差,养老风险感知越强,且年龄越大离受益期越近,越倾向于持续参保;年轻农民由于身体素质较好,对未来期望较高,养老风险感知较弱,加之距受益期较远,回收养老成本的不确定性更强,更多对制度持观望态度<sup>[8]</sup>。基于此,提出假设1: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忠诚度存在代际差异。

代际差异理论认为,代际差异反映的不仅有与个体生命历程和个人特征相联系的年龄效应,还包括周围环境反映的世代效应。不同的个体特征对于农民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反映的是代际差异中的年

龄效应,农民养老风险感知存在显著代际差异<sup>[31]</sup>,年龄越大距受益期越近,回报较快,越倾向于持续参保。同时,受教育年限和个体理性决策水平有直接联系,相较于年轻农民,中老年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制度信息获取主要依靠村干部宣传和与周围人群的互动,决策自主性较弱;青年农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其决策自主性较强。基于此,提出假设 2: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忠诚度的代际差异存在直接的年龄效应。

世代效应反映的是周围环境对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世代效应主要包括家庭、村庄和制度三个层面。中年农民正处于壮年阶段,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决策者,家庭负担相对较重,家庭经济收入更多投入在家庭消费、子女教育等方面,其持续参保决策更多是家庭整体决策的结果。青年农民结婚比例较低,其持续参保决策更多是个体自主判断的结果,中老年农民家庭负担相对较轻,持续参保更多是“最低 15 年缴费期限”制度约束和村域规范影响的结果。基于此,提出假设 3:农民家庭因素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村庄作为农民生活的主要场所,村域规范对于其参保行为具有重要影响<sup>[32]</sup>。中老年农民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集体主义观念较为浓厚,对于村干部的动员接受程度较高,与周围人群的互动不仅是其主要信息来源,更会对其持续参保行为产生影响。青年农民对于村域规范的接受程度低于中年和中老年农民,其持续参保决策更多是自身判断的结果。基于此,提出假设 4:村域规范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制度知晓水平和满意度是农民持续参保的重要影响因素<sup>[4]</sup>。相较于年轻农民,中老年农民对于中央政府和农居保制度的信任水平更高。年轻农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现代化信息传播渠道接触较多,制度信息来源更为广泛;其身体素质较好,对于自身的养老比较有信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难以满足其养老需求,其制度满意度相对较低。基于此,提出假设 5:制度知晓度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假设 6:

制度满意度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 二、变量选择与样本特征

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6—8 月在全国 5 省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 16 岁以上 60 岁以下的农村户口居民。采用五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共选取样本 1 500 个。采用入户调查方式,发放问卷 1 500 份,有效问卷 1 402 份,有效回收率 92.9%。其中,男性占 65.4%,女性占 34.6%;已婚占 83.4%,未婚占 16.6%。

借鉴已有研究,将忠诚度划分为认知忠诚、情感忠诚、意向忠诚与行为忠诚 4 个维度,设定 9 个指标进行测量并分别赋值。对 9 个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09, Bartlett 球形检验达到 0.01 的显著水平,说明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最大方差旋转获得 3 个因子,共解释 66.273% 的方差。分析因子负载,发现有 2 个指标交叉负载,不能准确反映所测量的潜在概念,剔除 2 个指标后重新对忠诚度的 7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sup>③</sup>。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结合解释方差比例,获得 4 个公因子,一共解释 83.928% 的变异。根据附注于 4 个公因子指标的含义,分别将 4 个公因子命名为“认知忠诚”“情感忠诚”“意向忠诚”和“行为忠诚”。因子分析给出了忠诚度 4 个线性无关的公因子,以公因子对忠诚度所贡献的方差比例为权重,将 4 个公因子合成忠诚度,并将其转换为 1—100 分之间的指数<sup>④</sup>。

同时,从农民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 4 个层面选取 13 个因素作为自变量(表 1),以分析检验不同世代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选择农民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婚姻状况、是否干部和受教育年限共 6 个变量。其中,性别、婚姻状况和是否干部 3 个定类变量采用虚拟方法构造变量,身体状况为定序变量,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家庭层面选取家庭年纯收入和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2 个变量。村庄层面包括村庄团结程度、村庄和谐程度<sup>[5]</sup>和邻里效应共 3 个变量。制度层面包括制度知晓度和制度满意度<sup>[4]</sup> 2 个变量。对邻里效应、制度知晓度、制度满意度进行信度系数法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其系数分别

为 0.867, 0.890, 0.917, 表明信度较高。

表 1 变量类型及其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层次	变量名称	测量尺度	变量赋值
因变量	个人层面	制度忠诚度	连续变量	因子分析合成变量
		性别	分类变量	男性=1; 女性=0
		年龄	连续变量	数值变量
		身体状况	定序变量	很差=1; 较差=2; 一般=3; 较好=4; 很好=5
		婚姻状况	分类变量	已婚=1; 未婚=0
		是否干部	分类变量	是=1; 否=0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数值变量
自变量	家庭层面	家庭年纯收入	连续变量	数值变量
		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定序变量	非常艰难=1; 比较艰难=2; 略微艰难=3; 些许宽裕=4; 比较宽裕=5; 十分宽裕=6
	村庄层面	村庄团结程度	定序变量	很不赞同=1; 不太赞同=2; 一般=3; 比较赞同=4; 非常赞同=5
		村庄和谐程度	定序变量	很不赞同=1; 不太赞同=2; 一般=3; 比较赞同=4; 非常赞同=5
		邻里效应	连续变量	因子分析合成变量
	制度层面	制度知晓度	定序变量	完全不清楚=1; 不太清楚=2; 一般=3; 比较清楚=4; 非常清楚=5
		制度满意度	定序变量	非常不满意=1; 不太满意=2; 一般=3; 比较满意=4; 非常满意=5

通过因子分析法构造邻里效应、制度知晓度、制度满意度、认知忠诚、情感忠诚、意向忠诚、行为忠诚和忠诚度变量, 为便于比较, 将其转化为取值为 1—100 的指数<sup>⑤</sup>。调查样本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青年(16—30岁) 均值(标准差)	中年(31—44岁) 均值(标准差)	中老年(45—59岁) 均值(标准差)	整体 均值(标准差)
年龄(岁)	24.51(3.20)	38.71(3.96)	50.38(3.96)	41.42(10.93)
身体状况	4.34(0.74)	3.83(0.86)	3.63(0.92)	3.84(0.91)
受教育年限(年)	11.86(3.57)	7.74(3.35)	7.12(3.16)	8.34(3.80)
家庭纯收入(万元)	5.06(4.79)	3.80(3.10)	3.96(3.43)	4.16(3.72)
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3.29(0.99)	3.57(0.97)	3.50(0.98)	3.47(0.98)
村庄团结程度	3.67(0.97)	3.92(0.92)	3.89(0.90)	3.85(0.92)
村庄和谐程度	3.72(0.87)	4.03(0.87)	3.99(0.85)	3.94(0.87)
邻里效应指数	50.64(18.92)	53.64(19.12)	56.76(19.25)	54.53(19.28)
制度知晓度指数	43.76(21.73)	51.36(20.97)	51.29(22.56)	49.66(22.15)
制度满意度指数	52.19(16.80)	57.13(17.88)	58.62(18.41)	56.77(18.08)
认知忠诚指数	56.38(19.87)	62.79(18.87)	64.19(20.22)	62.27(19.97)
情感忠诚指数	41.94(16.88)	47.66(19.66)	51.94(19.71)	48.76(19.54)
意向忠诚指数	32.39(33.61)	27.40(29.01)	26.34(26.96)	27.82(29.02)
行为忠诚指数	70.28(37.36)	70.28(36.58)	76.40(31.58)	73.44(34.36)
忠诚度指数	54.12(16.51)	59.44(16.56)	62.60(16.05)	60.04(16.59)

###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 1. 农民制度忠诚度代际差异及其分析

Oliver<sup>[14]</sup>将忠诚度分为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两个维度, 态度忠诚是认知忠诚、情感忠诚和意向忠诚的结合。采用因子分析法构造态度忠诚变量, 并转化为取值分布为 1—100 的指数。不同年龄阶段农民制度忠诚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世代农民农居保忠诚度

	青年 均值 (标准差)	中年 均值 (标准差)	中老年 均值 (标准差)	整体 均值 (标准差)
态度忠诚	48.96 (16.84)	54.74 (17.02)	57.17 (16.74)	54.87 (17.11)
行为忠诚	70.28 (37.36)	70.28 (36.58)	76.40 (31.58)	73.44 (34.36)
忠诚度	54.12 (16.51)	59.44 (16.56)	62.60 (16.05)	60.04 (16.59)
N	227	338	603	1168

就整体而言，中年农民的忠诚度高于青年农民，而中老年农民的忠诚度又高于中年农民。为了进一步验证不同世代农民忠诚度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对不同世代忠诚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不同世代农民忠诚度差异都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 4），假设 1 得到证实。

表 4 忠诚度代际差异 T 检验

	T 值	显著性	标准误
青年与中年	-3.754	0.000	1.418
青年与中老年	-6.649	0.000	1.276
中年与中老年	-2.863	0.005	1.113

从表 3 可以看出，中老年农民的态度忠诚度和行为忠诚度都明显高于青年和中年两个群体；青年农民态度忠诚度相对低于其他两个群体；中年农民态度忠诚度相对较高，行为忠诚度相对较低。参照 Griffin<sup>[17]</sup>的方法，将不同代际农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按照态度和行为两个维度进行划分。结果显示各个群体的行为忠诚度普遍明显高于态度忠诚度，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忠诚度整体属于“虚假忠诚”，说明当前较高的参保率更多是捆绑缴费政策和村干部动员的结果，并非出自

其对于制度的内在认同。进一步比较不同群体态度忠诚的和行为忠诚度，可以发现青年农民的态度忠诚度和行为忠诚度明显低于其他两个群体，属于“缺乏忠诚”；中年农民的态度忠诚度相对较高，而行为忠诚度较低，属于“潜在忠诚”；中老年农民的态度忠诚和行为忠诚水平都高于其他两个群体，属于“理想忠诚”。

2. 代际因素对忠诚度的影响及其分析

上述统计分析和检验表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存在显著代际差异，代际差异可以分为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年龄效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影响是直接的，表现为农民个体特征对于制度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可以通过年龄组变量来测量；世代效应反映的则是家庭、村域和制度层面等环境因素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通过年龄组的调节效应来测量。基于此，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年龄组对制度忠诚度的直接影响来测量年龄效应，构建年龄组和家庭、村庄、制度等环境因素的交互变量来分析间接的世代效应（表 5）。

表 5 忠诚度代际差异年龄效应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189***	0.058		
年龄分组(16—30 岁)					-4.826***	1.669
年龄分组(31—44 岁)					-3.086***	1.068
性别(男)	0.138	0.968	-0.401	0.977	-0.427	0.976
婚姻状况(已婚)	2.414*	1.428	0.017	1.599	0.550	1.674
身体状况	0.217	(0.537)	0.639	(0.550)	0.620	(0.547)
受教育年限(年)	-0.239*	(0.132)	-0.091	(0.139)	-0.108	(0.140)
是否干部(是)	3.408	(2.527)	2.379	(2.535)	2.519	(2.529)
对数家庭收入	0.832	(1.435)	1.217	(1.433)	1.191	(1.433)
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0.417	(0.555)	0.483	(0.553)	0.498	(0.553)
村庄团结程度	2.114***	(0.667)	2.167***	(0.665)	2.175***	(0.664)
村庄和谐程度	0.909	(0.703)	0.888	(0.700)	0.896	(0.701)
邻里效应	2.564***	(0.460)	2.470***	(0.459)	2.452***	(0.459)
制度知晓度	0.024	(0.024)	0.026	(0.024)	0.025	(0.024)
制度满意度	0.222***	(0.031)	0.213***	(0.031)	0.213***	(0.031)
常数项	31.178***	(4.440)	22.752***	(5.115)	32.259***	(4.450)
F 值	21.392***		20.745***		19.437***	
R <sup>2</sup>	0.189		0.197		0.199	
调整后 R <sup>2</sup>	0.181		0.188		0.189	
N	1 168		1 168		1 168	

注：年龄分组以中老年农民(45-59 岁)为参照组；\*\*\*、\*\*、\*分别表示 0.01、0.05、0.1 的显著程度。

(1) 年龄效应。首先检验个体、家庭、村庄和制度四个层面的变量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影响(模型 1)。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村庄团结程度和邻里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模型 1 基础上加入年龄变量(模型 2),年龄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农民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随着年龄增加而提高。在控制年龄变量后,婚姻状况和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性消失,表明二者和年龄密切相关,并非忠诚度的直接影响因素。而村庄团结程度、邻里效应和制度满意度依然显著,是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了检验代际差异的年龄效应,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年龄组变量(模型 3),年龄组变量(以中老年农民为参照)也通过了 0.0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年龄效应的存在,假设 2 得到证实。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即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忠诚度代际差异显著,相比中老年农民而言,青年和中青年农民对制度的忠诚度更低。

(2) 世代效应。为了检验世代效应的存在,构建了年龄组与家庭、村庄和制度层面变量的交互变量,以检验年龄组的调节作用,即间接的世代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6。

表 6 忠诚度代际差异世代效应回归分析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虚拟青年	9.751	8.771
青年*对数家庭收入	0.081	3.825
青年*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2.634	1.369
青年*村庄团结程度	-2.438	1.651
青年*村庄和谐程度	0.099	1.734
青年*邻里效应	-3.597***	1.206
青年*制度知晓度	-0.039	0.059
青年*制度满意度	0.083	0.080
虚拟中年	-9.428	8.430
中年*对数家庭收入	9.428***	3.340
中年*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1.704	1.273
中年*村庄团结程度	0.856	1.554
中年*村庄和谐程度	-2.027	1.660
中年*邻里效应	0.750	1.058
中年*制度知晓度	-0.124**	0.056
中年*制度满意度	0.124*	0.07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常数项	30.661***	5.579
F 值	11.131***	
R <sup>2</sup>	0.224	
调整后 R <sup>2</sup>	0.204	
N	1168	

注:年龄分组以中老年农民(45-59岁)为参照组;\*\*\*、\*\*、\*分别表示 0.01、0.05、0.1 的显著程度。

由表 6 可以看出,相较于中老年农民,年龄组(青年)和家庭养老保障能力、邻里效应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家庭养老保障能力和邻里效应对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受到年龄组的调节作用;相较于中老年农民,年龄组(中年)和对数家庭收入、制度知晓度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对数家庭收入、制度知晓度和制度满意度对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受到年龄组的调节作用。上述分析表明家庭、村庄和制度等周围环境因素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影响受到年龄组的调节作用,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代际差异的世代效应显著,假设 3、4、5、6 都得到证实。

### 3. 不同世代农民忠诚度影响因素差异及其分析

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世代农民制度忠诚度影响因素差异,本研究对不同群体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相比总体模型而言,分样本模型中年龄的显著性消失,进一步说明代际差异的显著性。同时,不同世代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就青年农民来看,只有制度满意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4),个体、家庭和村庄层面的因素都不显著,青年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忠诚度更多是对于制度满意度评价的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对持续参保更倾向于独立决策,不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这一时期农民家庭层面因素对其也没有明显影响。中年农民的对数家庭纯收入、家庭养老保障能力、村庄团结程度、邻里效应和制度满意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5),其中家庭收入的作用非常明显,表明中年农民长期参保意愿和持续参保行为更多是出于家庭整体的决策,同时,村庄团结程度和邻里效应的显著性表明中年农民容易受到村干部的动员和周围人群的影响,其持续参保更多是社会理性的结果。中老年农民的村庄团结程度、邻里效应、制度认知和制度满意度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 6)这一群体出生于计划经济时期,集体主义观念较为浓厚,对村干部的政策宣传接受程度较高,且信息渠道较少,更多是从周围人群获得相关信息,易受周围人群影响。中老年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非常有限,制度知晓度和满意度显著影响了其对于农居保制度的忠诚度(表 7)。

表 7 不同世代农民对农居保制度忠诚度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4(青年)		模型 5(中年)		模型 6(中老年)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549	0.428	0.107	0.225	0.123	0.431
性别(男)	-2.135	2.310	-0.167	1.748	-0.578	1.008
婚姻状况(已婚)	2.190	2.970	5.576	5.076	-1.926	3.566
身体状况	1.043	1.646	0.414	1.059	0.603	0.692
受教育年限	-0.505	0.334	-0.182	0.273	0.147	0.205
是否干部(是)	7.551	16.131	-2.046	5.182	3.518	2.889
对数家庭纯收入	0.216	3.673	7.847***	2.913	-1.095	1.858
家庭养老保障能力	-1.813	1.261	2.085**	1.059	0.556	0.755
村庄团结程度	-0.029	1.449	3.252***	1.254	2.422***	0.935
村庄和谐程度	1.455	1.530	-0.768	1.329	1.260	0.985
邻里效应	-0.628	1.132	3.615***	0.846	2.999***	0.634
制度知晓度	0.027	0.054	-0.062	0.047	0.056*	0.032
制度满意度	0.234***	0.075	0.288***	0.060	0.156***	0.040
常数项	56.355***	15.914	15.556	13.027	28.763***	10.361
F 值	2.542***		6.891***		11.169***	
R <sup>2</sup>	0.135		0.226		0.208	
调整后 R <sup>2</sup>	0.082		0.194		0.190	
N	227		338		603	

注：\*\*\*、\*\*、\*分别表示 0.01、0.05、0.1 的显著程度。

####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 2015 年全国 5 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1) 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忠诚度属于一种低态度忠诚与高行为忠诚相结合的“虚假忠诚”，农民对于这一制度的内在认同仍然较为缺乏，将对该制度养老保障效果发挥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 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这种代际差异是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3) 青年农民制度忠诚度是个体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理性判断的结果，中年农民的忠诚度则受家庭整体状况和村域规范的影响，中老年农民的制度忠诚度则受制度知晓度、制度满意度和村域规范的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如下启示：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应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激励政策，有效提升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忠诚度；制度知晓度和制度满意度是影响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的重要因素，应进一步扩大宣传力度，切实提

升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知晓水平和内在认同，使其从“虚假忠诚”转化为“理想忠诚”；农民的参保决策并非经济理性假设下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村庄团结程度和邻里效应等村域规范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忠诚度有重要影响，应重视发挥社会互动等非正式渠道的宣传和带动作用<sup>[32]</sup>。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② 1979 年 1 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贯彻 69 号文件，独生子女政策由此开始。而考虑到农村地区实施困难，1984 年后，决定实行“一孩半”政策，即第一个是女孩的家庭，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 ③ 认知忠诚采用农民对如下 3 个问题的赞同程度进行测量：“对解决我的养老问题很重要”“可以提高我的老年生活质量”“是我以后养老的重要依靠”；情感忠诚采用如下 2 个问题进行测量：“我会劝说周围人缴费参保”“我给周围人传递过新农保的信息”；意向忠诚采用 3 个问题进行测量：“我会继续缴费参保，不会中断”“持续参保是我非常正确的选择”“无论以后经济条件如何，都会续保”；行为忠诚采用 1 个问题进行测量：“从政策推行至今，您家是否间断过缴费”。
- ④ 限于文章篇幅，具体因子分析结果未呈现。
- ⑤ 指数=(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

小值);  $B = [(因子最大值 - 因子最小值) / 99] - 因子最小值$ 。

### 参考文献:

- [1] 马杰, 陈玉照. 可持续·新农保生命力的实证考察[J]. 当代经济管理, 2013(5): 83-89.
- [2] 顾文静.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激励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J]. 人口与经济, 2012(1): 86-90.
- [3] 黄瑞芹. 贫困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两个贫困族自治县的调查[J]. 社会保障研究, 2013(1): 28-34.
- [4] 吴玉锋, 周明. 农民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忠诚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4): 84-90.
- [5] 姚俊. 理性选择、外部激励与新农保连续参保——基于四省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4): 111-120.
- [6] 钟涨宝, 聂建亮. 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探讨——基于农民参保行为选择的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6): 60-70.
- [7] 李强, 岳书铭, 宋霞.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持续参保行为实施意愿的作用机理分析[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37-42.
- [8] 李越, 崔红志. “新农保”参保决策制约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4(2): 224-232.
- [9] 穆怀中, 闫琳琳.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2, 36(1): 73-82.
- [10] 成志刚, 曹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对湖南省试点县数据的分析[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1(1): 11-16.
- [11] 李伟, 姜东升. 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的调查与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5, 30(8): 80-86.
- [12] Oliver R L. Whence consumer loyalty[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9, 63(SI): 33-44.
- [13] Gremler D D and Brown S W. Service Loyalty: A Global Perspective[M]. ISQA, New York, 1996: 171-180.
- [14] 汪纯孝, 韩小芸, 温碧燕. 顾客满意感与忠诚感关系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03(4): 70-74.
- [15] Griffin J. Customer loyalty. How to Earn it and Keep it[M].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1995.
- [16] Mannheim K.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M]// Mannheim K.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 276-322.
- [17] Ingehart R. Aggregate stability and individual-level flux in mass belief systems: the level of analysis paradox[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5, 79(1): 97-116.
- [18] Ryder N B.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5(30): 843-861.
- [19] Strauss W, Howe N. Generations: The History of American's Future 1584-2069[M].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 183-205.
- [20] Schuman H, Scott J. Genera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3): 359-381.
- [21] Schuman H, Rodgers W. Cohorts, chronology and collective memories[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4, 68(2): 217-254.
- [22] Twenge J M.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attitudes[J]. Journal Business Psychology, 2010, 25(2): 201-210.
- [23] Stewan J S, Oliver E G, Cravens K S, et al. Managing millennials: Embracing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J]. Business Horizons, 2017, 60(1): 45-54.
- [24] Noble S M, Schewe C D. Cohort segmentation: an exploration of its validity[J]. Journal Business Research, 2003, 56(12): 979-987.
- [25] Howe N, Strauss W. The next 0 years: how customer and workforce attitudes will evolve[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7, 85(7/8): 41-52.
- [26] 魏万青, 陆淑珍. 禀赋特征与机会结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代际差异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2(1): 13-21.
- [27] Oznoobishinn O, Kurman J. Family obligations and individuation among immigrant youth: Do generational status and age at immigration matter?[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6, 51(1): 103-113.
- [28] Deneker J C, Joshi A, Martocchio J J.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linking generational memories to workplac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8(18): 180-187.
- [29] Egri C, Ralsston D. Generation cohor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comparis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15): 210-220.
- [30] 吴玉锋. 社会互动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实证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5(14): 105-111.
- [31] 金刚, 张秋秋, 闫琳琳.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研究——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J]. 辽宁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2(4): 64-71.
- [32] 钟涨宝, 李飞, 冯华超. 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J]. 人口与经济, 2016(6): 72-81.

责任编辑: 黄燕妮